

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

*

——「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

張文薰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助理教授

摘要

1937年以後台灣文學中出現大量以歷史題材創作的小說，其中「國姓爺」鄭成功史事更為台灣人與日本人作家競相書寫的對象。「國姓爺」故事本來在日本、台灣、中國與西歐等地就存在著不同的傳述方式與途徑，出生於日本的鄭成功絕非專屬於台灣的歷史人物。本論文將先從「國姓爺」形象在日本近世文學中出現至1940年代戰爭期為止，論述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國姓爺」故事書寫熱潮的時代中，其故事創造過程之社會、思想史的意義。其次則視西川滿〈赤崁記〉為眾多日本、中國前行「國姓爺」文本系譜，以及與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互文」的結果，並論述其中敘事策略所顯現的，戰爭期間在台內地人的在地認同與書寫欲望的關係。

關鍵詞：國姓爺、鄭成功、歷史小說、內地人文學、西川滿、《台灣外記》

* 本論文之前身曾發表在美國USCB大學“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Colonial Modernity”，「日治時期台灣研究：文化移譯與殖民地現代性 2010年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以及2011年2月在韓國東國大學“The Culture of Modern East Asia”。後經改寫於2011年6月投稿《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經匿名審查委員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後進行修改，特申謝忱。

Historical Novels and Localizational Identity:

Nishikawa Mitsuru's "Sekikanki" in the Stories of "Koxinga"

Chang Wen-Hsu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A number of novels feature on history bloomed in Taiwan Literature after 1937, and the story of "Koxinga" was popular among both Taiwanese and Japanese novelists. The stories of "Koxinga" have been spread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out Japan, Taiwan, China, and even West Europe. Through born in Japan, "Koxinga" Cheng Ch'eng-kung is a historical character, whom not only belongs to Taiwan. In this paper, I will discuss the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Koxinga"'s storyforming prosses, from eighteenth century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the image of "Koxinga" appeared in earl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o the interwar 1940s . Secondly, by regarding Nishikawa Mitsuru's "Sekikanki" as one part of the genealogy of "Koxinga" in Japan and China, and also as a intertextualized result with Sato Haruo's "Jokaisenkitan", I will discus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identity and writing desire of Japanese people who were in Taiwan in interwar time through their narrative strategies.

Keywords: Koxinga, Tei Seikou, Cheng Ch'eng-Kung, Historical Novel,
Nishikawa Mitsuru

歷史小說與在地化認同

——「國姓爺」故事系譜中的西川滿〈赤崁記〉

一、前言：1937年後文壇重編與創作趨向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已屆四十餘年的台灣亦進入戰爭時期。文學文化的發展未必與歷史事件亦步亦趨，但同年台灣軍介入新聞報刊的經營，間接促使報紙漢文欄廢止，楊逵主導的《台灣新文學》亦在經濟與稿源匱乏等多端因素下停刊。在1920年代台灣民族社會運動中萌芽，文化啟蒙色彩甚濃之「台灣新文學運動」於是在此階段劃下休止符。然而「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停歇，並不同於所有在台灣從事文藝活動者皆進入「空白期」。亦起步於1920年代的在台日人（時稱「內地人」）之現代文學活動，在1937年以後小說新詩創作、刊物編輯發行仍持續進行著，甚至因為學院、公私機構的涉入而整合蓬勃。台灣人（時稱「本島人」）方面，《台灣新民報》文藝欄、漢文通俗雜誌等場域仍可見創作發表蹤跡，甚至龍瑛宗在《文藝首都》等日本媒體發表稿件，皆可視為1937年之後，台灣文學文藝相關人士之視野與活動場域並非停歇、而是更趨活潑與多元化的象徵。

如果捨棄意味著活動停止或內容貧乏的「空白期」界定，而將1937年7月視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轉捩點，那麼以下二大現象的出現即具備文學史的重要意義。第一為文學場域的重整，1937年前內地與本島作家活動場域涇渭分明，幾無交涉；但1939年「台灣詩人協會」創立後，皆以日文為創作語言的雙方作家開始出現或協力或頤頤的合作關係。第二為本島與內地人作家選擇書寫題材的趨近。台灣民俗題材、歷史敘事性故事在內台人小說作品中大量出現，本稿的重心即在於後者意義的論析。¹

1 關於1930年代後期台灣文學場域整合之論析，請參見筆者，〈1940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台灣文學學報》19期（2011.12），頁99-132。

歷史題材的改寫涉及時間的跨越與空間條件的重構，且歷史故事幾經傳述多有底本，改寫創作更涉及語言與文化翻譯問題。另一方面，歷史題材本身既已為讀者所熟悉，1930年代文藝界所奉行之「寫實主義」，就無法做為修飾文本粗略肌理的大義。作者與讀者藉以理解歷史題材的知識脈絡與能力，想像能力的催動、日語文敘事組織能力等，涉及書寫本質的要求必然升高。換言之，歷史題材小說大量出現的現象，暗示著1940年代台灣文學文化場域裡，共有文化資本的高度可能。而此處的文化資本不僅是指書寫手段——日文，具備高知名度（辨識度）與共通性的符號與題材，方足堪文學文本的搬動取用，且將動輒影響作品成就與可讀性。更甚者，已成為共同知識或記憶的歷史故事之重述，本就具有創造國族神話、建構文化源流的意圖。不同族群、文化身分的作者對同一歷史題材的競寫，在文本對讀比較研究下，當具再探民族主義與文化想像關係之意義。

另一方面，中國與日本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即已大量出現將創世神話與歷史人物，英雄化或戲謔化地改寫為小說的現象。²從勾勒東亞文化圖像與權力譜系的層面來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出現大量歷史題材小說的現象³，除了慣見之「在地歷史詮釋權的爭奪」觀點之外，應具有更為深層與廣泛之意義。

國姓爺鄭成功的存在，對於日本與中國、台灣皆深具國族意涵，歷來傳頌記述其事蹟的文本極多，1940年代在台灣更同時出現了數種版本。歷史題材在現代小說化過程中的語言更換，以及先前故事版本在其中的堆疊錯雜，可視為探析這些「文本」形成與存在意義的有效觀點。本文將以包括西川滿〈赤崁記〉在內、出於「內地人」作家之手的鄭氏歷史改寫作品文本為探析對象，就其（一）書寫語言脈絡轉換（二）與前（潛）文本的同異，參照十八世紀以來鄭成功人物形象在日本思想史及文化史上的意義論說，冀能為後續或後繼所從事之戰爭期文學現象的分析研究，提出一個具有呈現台灣圖像與海洋想像意義的詮釋框架。

2 中國方面如魯迅《故事新編》（1935），日本方面較早如橫光利一〈日輪〉（1923）、太宰治《右大臣實朝》（1943）等可視為代表。

3 同註2。

二、定位不可能的「國性爺」鄭成功

就台灣開拓史而言，鄭成功驅逐了盤踞台灣西海岸港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初步確立漢人對於台灣的控制權之「開台」事功意義重大⁴。但其行動選擇與空間移動，卻使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日本與十九世紀以後的台灣，可從相異甚至相反的立場，對其存在意義做出歷史性的正面評價⁵。鄭成功誕生於十七世紀東亞海上私人商業貿易極盛期的日本平戶⁶——從十五世紀末即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來此傳教與貿易，中國海盜（或船商）如王直、鄭芝龍等在此生活與往貿的海港——鄭成功即由鄭芝龍與平戶女子田川氏所生（1624），7歲甫歸福建南安。由海盜招降後擅窺局勢而位極榮華的鄭芝龍，先是在南明與清軍之間挾兵自重遊移不定，後更降清並欲一併招降其子鄭成功。鄭成功經歷與父親決裂、母田川氏自盡，以東南沿海與諸島為基地抗清；攻打南京失敗後，接受任荷蘭人通事的何斌之建議與引導，擊退視台灣南部為東亞貿易基地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使原為海盜、荷蘭、西班牙等航海勢力盤踞下的台灣，成為南明的最後據點之一、與大陸政權之間正式產生連結。鄭成功在攻台一年後死去（1662），後繼者其子鄭經、孫鄭克塽未能成就大業，鄭氏三代在台灣的经营統治於1683年結束。

鄭成功個人生平史事有著極為明確堅定的輪廓——反清復明，以福、唐、桂三王為象徵的漢人明政權為忠貞對象，對抗異族滿人入關建立的清朝。然而由於鄭成功出生於日本，鄭氏一族藉與日本貿易累積財富，並「寄銀」、「乞師」於日本的經歷，使鄭成功中日「混血」形象的象徵意涵遠超過其真實血統。從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塽一族四代的活動時期正屆晚明鎖國、李自成反亂、崇禎帝自盡、清兵入關的戰爭亂世，日本方面則為德川家康結束戰國時代於江戶開立幕府、建立鎖國體制；原為海外宗主從屬關係的中日雙方，

4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04），頁19。

5 在前揭江仁傑著作，以及曾居住於台灣的日本學者石原道博，《國姓爺》（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中皆有詳盡介紹。

6 廖肇亨，〈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域外漢籍研究集刊》3輯（2007.05），頁104。

都處於正在確立中央與周緣地理權力關係，重整政治文化秩序的混沌時期。⁷在中日兩道鎖國令下，挾船舶兵器之武力而遊走於明帝國、德川幕府統治之矛盾與夾縫間，獲得暴利與權力的崛起型態；藉九州港口、舟山列島、廈門金門、澎湖台灣等波濤掩映的島嶼為據點的地緣關係，都顯示鄭氏一族史事難以被單一地區、國家、民族所定義的複雜身分，而毋寧與流動變化之東亞海洋的關係更為密切。⁸同時，無論是明清之交的中華帝國、甫結束戰國時代的德川日本，亦都難以現代國族國家的概念予以理解。但也許正是在這中日海陸交錯、以儒教文化中國為尊的華夷秩序漸次崩解的動盪時代裡，鄭成功那不惜與生身父親對立、亦欲遂全節於君的忠貞單一節操，更顯現其精神上的純潔與高貴，也使這抱憾而終的儒生英雄，具備在不同時代、地區不斷被再造改寫的形象趨力。

鄭克塽移封北京後，遺留在閩台一帶的鄭氏文物遺跡多遭毀壞，於官方文書與資料中多逕稱為「偽」，貶抑之意居多，少有能持平直見者。當代藉以建構鄭成功事蹟之重要史料如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清代官書記明台灣鄭氏亡事》、《明清史料》等，無論其撰寫年代為何，皆在二十世紀後才為世人所見。但在1874年（清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之後，意識到台灣海防地位重要性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設置「延平郡王祠」之前，台灣各地已存在數座傳頌鄭成功靈驗傳說的廟宇。近世以來流傳於包括中國、台灣、東南亞等華人地區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形象，殆構築於非官方文書記錄的民俗信仰與民間文學層次。

鄭成功的最後重要戰役，則是打敗了「發現東方」的西洋殖民勢力——荷蘭，鄭氏在台灣並有經略南洋呂宋以建立反清勢力的計畫。鄭氏史事與後世對其所從事的敘述、考察與再製中，揉雜了（一）漢人中心／滿人異族（二）中華／日本（三）東洋／西洋等三組對立卻又互為鏡像而生的關係。此三者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西風東漸時期再度浮現，而成為中國與日本、以及

7 江戶幕府為禁止基督教對其權威的挑戰，以及統制貿易，在1633-1641年間陸續發佈禁止日本人出國與外國商船往來，僅允許中國與荷蘭二國商船在長崎貿易的命令，謂之「鎖國令」。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2卷3期（1999.09）。

8 周婉窈，〈海洋之子鄭成功〉，《面向過去而生——芬陀利室散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9.07），頁360-427

日本最初海外殖民地的台灣建立在地化自我認同之際的言說焦點。縱橫島嶼海路、匯通征戰東西洋勢力的歷史戰略位置，以及前朝悲劇英雄身世與隨之而生的史料散毀，使鄭成功的形象塑造與傳頌過程中，鄉野軼事、民俗宗教等來自在野、地方的民間口傳與記憶資料，在政治秩序變動與倫理價值崩搖的歷史時刻，成為言說與書寫行為的必然基礎。鄭成功人物與其歷史故事的形成過程，也因為介在了民俗文化、常民記憶而與國族、在地認同等自我界定行為曖昧難分。

在日本，鄭成功是以「國性爺」（國姓爺）之名深入文人知識與庶民娛樂生活中。⁹早在1700年左右日本即出現以其為題材的文本，¹⁰但使「國性爺」人物形象成為傳誦至今的日本之文化財產者，當推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琉璃《國性爺合戰》。此劇於1715年11月在大坂竹本座首演後，連續上演17個月，八成以上的大坂人都具觀看經驗。¹¹內容敘述奸臣李踏天出賣明朝外通韃靼，忠臣吳三桂則奉先帝遺孤藏匿於九仙山。明朝梅檀公主逃難漂流到日本平戶，為「和唐內」所搭救。和唐內與父親老一官、母親一同回明，為求援助而造訪同父異母妹妹錦祥女與甘輝夫妻。起初拒絕搭救的甘輝在錦祥女與和唐內母親死去的刺激下，與和唐內聯手結盟，最後消滅韃靼與李踏天，迎回幼主再建明朝，和唐內因此受封為國性爺延平王。由上述簡要內容可知，此部創作戲曲的地名、人名與情節始末皆迥異於史事經緯。此劇直到今日，仍在日本傳統曲藝領域反覆上演，對於近世以來日本之鄭氏國性爺認知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力。

《國性爺合戰》問世後，包括原作者近松門左衛門在內的劇作家，短期內產出多達二十餘種「國性爺」文本，其中容或存有差異，但多在塑造國性爺和唐內（亦寫為「和藤內」）的個人特質層面加以變化。平戶出身之戰神鄭成功的超群武藝、忠勇不二形象深植日本庶民社會。¹²在這藉善惡分明的人格與英雄烈女形象營造戲劇張力的故事中，可以發現存在著（一）對於中華域內滿清政權

9 一般而言，在日文中稱「國性（姓）爺」時多指出現在戲劇與文化脈絡中的鄭成功，而人物史實考察的學術脈絡則逕稱「鄭成功」，但仍有混用。

10 錦文流所著《國仙野手柄日記》。資料存在與時期，見註4，頁45。

11 石原道博，《國性爺》，頁86。

12 神谷勝広，〈豆本『国性爺合戦』——広範な流布の可能性〉，演劇研究会《演劇研究会報》31号（2001.06）。

之徹底忽視（二）強化女性力量之影響的結構性因素。而從「生養於日本的國性爺」，「如今成為大明的援軍奮戰不歇」的文字裡，更透露日本具備挽救中國國運的能力，中日關係由「主從」轉變為「並立」的訊息。¹³

通俗文學劇作之外，漢詩作品如賴山陽（1780-1832）「英魂千載遊桑梓，楠公父子問可無」，將鄭成功比附於南北朝分裂時期奉後醍醐天皇為尊、以致犧牲生命的楠木正成、正行父子，凸顯鄭氏英魂與大和「桑梓」的密切關連。蜀山人的「空傳忠義國姓爺，終看韃靼奪中華」，則顯現對於鄭成功早逝的惋惜，以及清朝（夷）取代明朝（華）之歷史因果論斷。值得注意的是，蜀山人、四方赤良、寢惚先生同為大田南畝（1749-1823）的筆名，其亦作有《漢國無體 此奴和日本》（1784）一書，是擬仿《國性爺合戰》的戲作（parody）。其將《國性爺合戰》中所呈現的中日並立的權力關係，更進一步激化為日本優越於中國，此與賀茂真淵、本居宣長的「國學」體系化進程並行，顯現了十八世紀後半的華夷觀逆轉與日本「皇國」、「神國」意念的成形。¹⁴

而此階段的國性爺題材書寫中，「台灣」時代的鄭成功事蹟從未成為重心，甚至是完全沒有提及；此現象亦顯示直至江戶時代晚期，無論在思想文化或國際政治版圖上，日本所面對或想像的主要對峙者從來都只限於中國。在德川幕府成立之前豐臣秀吉政權，雖曾有過出兵朝鮮、對菲律賓宣威的軍事與外交行為，但這些行動背後的核心實在於向明、西班牙等帝國的自我國家主權意識確立。作為從屬國的朝鮮、無主之地的台灣在日本近世史中的存在並非版圖之開拓延伸，而是與中國關係的折射、甚至只是淡薄的陰影。

「國性爺」故事再度成為焦點題材，是在1874年日本「征台之役」（即「牡丹社事件」）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本得到台灣為其首處海外殖民地之際。

13 井上厚史，〈『国性爺合戦』から『漢国無体 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華夷観の変容〉，《同志社国文学》58号（2003.03）。

14 國性爺故事與「華夷變態」、日本國家意識形成過程的關係，可參見上引井上厚史以及江藤淳，〈「国性爺」と国家意識・近松門左衛門（3）——文学史に関するノートー8〉，《文学界》20（1966.01）。

讀吧！讀吧！諸君！這記錄著舉世聞名的國姓爺，以日本人氣概奮戰滿清的偉大壯圖。奪下台灣！快奪下台灣！以慰國姓爺於天之靈。讓日本的種子萌芽吧！讀吧！讀吧！諸君！這國姓爺的討清記！¹⁵（依田百川，《國姓爺討清記》，1894年10月）

如今，讓將軍鄭成功壯志未酬，抱憾而終的清朝，終於無法抵禦我等仁義之師。在已略見媾和修復、友善外交的局勢下，將軍絕命之地台灣，將歸於其出生之大日本帝國版圖，平定匪徒之日有期。可想見將軍英魂應在天上人間朗闊遨翔，仰望著大君的崇高威稜。（丸山正彥，《台灣開創鄭成功》，1895年10月）

從上引兩段征台期間風行於日本國內的言論文字中，可看出處處強調的是國姓爺鄭成功身為日本人、卻飲恨死於台灣的部分；而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打敗清朝，毋寧是後裔為其雪恨的報仇行動，也得以合理地進一步朝向「討清」以貫徹其精神。在這些充滿了煽動日本國內輿論，以確立海外擴張正當性的民間言論裡，不僅「清」作為國姓爺／日本的敵對面被重複顯現，更使在「國性爺和唐內」時期中從未被提及的「台灣」以「奪下」與「回歸」的兩種模式，進入日本近代的國性爺書寫脈絡中。

至此，在日本文學文化的脈絡中的「國性爺」故事傳頌，除了庶民對大和英雄「和唐內」悲劇性的情感需求，以及統治階層與士人知識份子間對於清朝中國之文化正統性的質疑與否定之外，更因為鄭成功「終焉之地」台灣，轉換成為象徵明治維新後新興帝國「新領土」，而加添變化轉調的層次。

辛亥革命後，「國性爺」之仇敵也就是清朝覆亡，與台灣人民同種族之漢人再度成為中國的統治者，此時以承續「國性爺」未竟之志抗清以治理台灣，「代華制夷」的日本帝國思維即面臨挑戰。1914年1月，為紀念創立五週年，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出版《國姓爺後日物語》，其中收錄鹿島櫻巷〈國姓爺後

15 原文為日文，由筆者翻譯為中文，文責自負，以下引用之日文史料皆同；除卻須強調其文字與文脈的近似與傳承之處以外，不另引原文。

日物語〉以及〈台灣紅淚史〉二篇作品。¹⁶旅居於台灣的日本人以在地身份立場，加入了原本皆由日本內地創作者專擅的「國姓爺」敘事行列。不同於之前以鄭成功本人、從日本渡海至中國華南、忠於明朝奮戰之生平事蹟為重點的書寫方式；如其書名「後日物語」所示，此後國姓爺故事的敘事重點轉為鄭成功將主力移往台灣的生涯後期，以及其死後的後繼台灣統治者之事蹟。

〈國姓爺後日物語〉為一劇本，上卷第一幕為鄭成功攻打台灣，叔父鄭芝豹趁隙引已降清之黃護龍軍隊攻佔思明州，城落之際崇明伯甘輝為保董氏與幼主鄭經，而在海邊殺死妻兒後自盡。事實上，甘輝雖確實死於思明州陷落之役，卻是俘至城內後被殺。這種王朝覆亡之際，忠臣為護主君遺孤而不惜弑子的情節，常見於中國朝代交替、藩國交戰時的亂世傳奇，以及日本以《平家物語》、《太平記》為代表之軍記物語故事。可知〈國姓爺後日物語〉雖意在書寫「國姓爺後日」的「台灣」，卻仍繼續《國姓爺合戰》中的英雄甘輝之虛構性，使在台灣日本人的鄭氏史事書寫延續了內地「國姓爺」的故事脈絡，但更進一步強調其抱憾遷台的悲劇性格，以便合理化新領土「台灣」對日本的存在意義。第三幕中陳永華陳述台灣在中華南海、南洋航路的交通樞紐性質，更以物資豐富而不只可供恢復大明，進一步能成就遠征南洋的願景。鄭成功則答曰自己欲效法日本英雄豐臣秀吉，征討三韓以拓張日本海外屬國，若恢復大明之後將離開台灣遠征南洋，台灣統治經營將全委由陳永華辦理。下卷第一幕中揭示了陳永華的身份原來是日本武士，其嫁與鄭經長子鄭克臧的女兒也因此孝順虔誠、「氣質異於常人」。在鄭克臧被誣以螟蛉子而誅殺後，這「十年前離開故鄉日本的生母，穿越海路與父親隻身至此」的陳氏夫人，著一身全白的「日本式死亡裝束」以短劍自盡，贏得「不愧是日本武士陳永華之女」的歎譽。

陳氏夫人隻身越洋別母投父的情節設定，顯然疊合於鄭成功母親田川氏的實際生平；而以「下髮、白無垢、短劍」自盡的畫面之戲劇張力極強，使開展於台灣的國姓爺「後日物語」，仍具有活躍於海外之大和魂之基調。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治理台灣具有完整規劃與偉大功績的陳永華之出現，是為二十世紀

16 鹿島櫻巷著，《國姓爺後日物語》（日本東京：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 1914.01）。

的鄭氏史事書寫與國姓爺和唐內故事時期之重大轉變，而日本血統成分被稀釋的鄭成功（作品中被稱為「藩王」）則為心馳海外的領導者。「後日物語」固然有著續寫「合戰」之後的國姓爺事蹟的意圖，但更以陳永華人物的設定，拓造出不同於十九世紀以前僅在中國大陸與日本列島的雙元對峙關係。「台灣」以及南洋、南方版圖的開拓是超越「華夷」秩序的嶄新可能性，而這樣的可能性正是從「鎖國」到「帝國」的維新後日本之新興性格的象徵。另一方面，西南戰爭後在日本島內已成為必須嚙口的「武士」行為模式，卻仍在新殖民地台灣的通俗文本中傳流，此不啻為思考東亞漢文文化圈的勢力變遷的切面之一。

《國姓爺後日物語》所收之另一作品〈台灣紅淚史〉，則迥異於以人物對白與畫面構成的劇本〈國姓爺後日物語〉之戲劇呈現方式，而存在著一個大量閱讀「鄭氏四代事蹟」史料的敘述者「我」，在消化這些「詰屈聱牙」的「漢文史料」後，以「平易近人」的日語文向讀者重述鄭氏史事。

明朝之衰亡史，實備極悲壯慘澹，壯絕人世。今日，清朝亦逢亢龍生悔，社稷頽亡之際，以今昔之比，實予人感慨無限。

在此，我將講述明朝興亡史，而全篇將以悲壯淋漓的佳人傳記為軸。在這些引人哀憐痛惜的史實焦點中，身為我國同胞的女性身處其中，更令人同情無限。因此題為「紅淚史」以資世人共惜之。

從〈台灣紅淚史〉卷首「第一 鄭家之女系圖」的上引文字中，可知此作以鄭氏史事中的女性為中軸，欲以史事資今日社稷之教訓；但因「我」極力強調自己閱讀史料後的思考心得，使全篇充溢介於史事講述與小說創作之間的「物語」基調。鄭氏女系圖為田川氏、董國太夫人、陳氏（鄭經之妾）、陳氏（鄭克臧之妻）等鄭家妻妾，最後旁及寧靖王之五妃，強調其為夫家（鄭氏、寧靖王）生死相殉的貞烈情操。此一敘事策略在具備吸引讀者的浪漫故事與情調之外，更契合於出版契機——「愛國婦人會」的創立宗旨。

〈台灣紅淚史〉以鄭成功妻董國太夫人與拿破崙妻約瑟芬對比，試圖解釋鄭成功在聽聞鄭經侍妾生下長子後，下令殺死董夫人、鄭經、陳氏妾、長孫，

後隨即憂憤而死的鄭氏關鍵史事。並強調董夫人能察覺鄭成功之個人道德要求絕高，其偉大處正呈現「東洋式」女性美德，遠非約瑟芬「歐羅巴式」的膠纏戀愛所能比擬。而董夫人在鄭成功征戰於外之際，在根據地主持「如紅十字會或愛國婦人會」的事業，「裁縫機械、看護癯養」甚至設立「被服廠」，作者更強調《台灣府誌》中即記載鄭成功軍中所用多為王府內手製品一事，以昭公信。董夫人在鄭成功死後以「垂簾聽政」之勢統管政事，在鄭經引軍回澎湖時大罵其「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乏權略果斷，無任人之明，故左右各竊其權，各樹其黨」（原文：「七府連に敗れ、両島も亦に喪ふ。皆汝が権略果斷に乏しく人を任するの明無く、左右権を竊み各々其党を樹てしむるに由るのみ」）。在鄭氏女系圖中是唯一以英朗果斷，能任政事著稱者。

而在清軍破城之際奮戰而死的田川氏，則如「大阪落城之際的淀君」、「籠罩在天照大神靈威下眾星燦燦，提起父親七左衛門所傳的三尺秋水兵器，如電光般閃入春風影裡，那柳眉與如吐出火焰的丹唇足以睥睨四百餘州」。但最富「紅淚史」與鄭氏末路悲劇的象徵意涵者，莫過於鄭克臧妻陳氏女。在鄭克臧意識到自己被馮錫範所嫉恐遭不測之時，叮囑已懷孕的陳氏「若有萬一，千萬珍重生命，以鄭氏百年大計為重」，陳氏則「臉色一變」，答以「府中無其他人可堪依靠，若郎君有所不測，等於鄭氏滅亡。願隨郎君共負黃泉」。而這「一代閨秀」在「貴公子」鄭克臧遇害後，即以「干將莫邪亦無法抵擋」的銳利語詞詰問已老去的「女中豪傑」董國太夫人之決策，更以「成立之父，尚未能保七尺之身，何況此呱呱爾」（原文：「成立の父、尚ほ七尺の身を保つ能はず。何んぞ況んや此の呱呱をや」）為由決心殉死。董國太夫人在勸阻無效後為嘉獎其志，遂「命人造一蓮花形狀的豪華之台」以贈之。殉死當日，陳氏以「華鬢鳳釵、錦繡綾羅」裝束，在「蓮花台」上投縊縊死。自以上文字可知，對田川氏與陳氏女的描寫，皆強調裝容燦麗、以及陰柔堅貞的美德。

〈台灣紅淚史〉作者緊接著強調這些看來出人意表的描寫「絕非虛構」，雖然「關於鄭氏之傳述無一記及」，但確有「文獻歷歷，以供徵之」。然而在前半部分可明確列舉如江日昇《台灣外記》、《台灣府志》、德川家編纂《駿府政事》、帝國大學編纂《大日本史料》、小宮山南梁《德川太平記》、葉山

高行《河內浦鄭氏遺跡碑》等文史記錄名稱的作者，此處卻無法舉證任何文獻篇名，而僅以「文正公兮文正女」這首「俚謠」傳唱於台灣全島、並《台灣府志》記載鄭克臧夫妻鬼魂出沒於白晝一事等不見於文字的民俗口傳資料，作為鄭克臧原為鄭氏正嗣卻遭嫉而死，以致昏庸的克塽即位鄭氏走向敗亡的史實證明。

〈台灣紅淚史〉強調女性存在對於以男性為主體的歷史之重大影響力，實延續《國姓爺合戰》中以平川氏、梅檀公主、錦祥女等真實或虛構的女性角色，引領襯托「和唐內」形成辨明敵我之忠勇人格的「陰性」伏線。女性的聲音、民俗口傳資料等不見於經傳之資料的運用，確實提供龐駁史料所欠落的物質與情感元素，使改寫歷史題材行為得以在定型的敘事框架下，賦予或加添符合書寫當下閱讀習慣——同時代社會條件——的血肉。然而對照於前半部分對於史料名稱的大幅度標舉，後半田川氏與鄭克臧妻陳氏女的殉死、鬼魂現世的情節唯有民間傳說、民謠可為之佐證；此一史實性的不對稱，與明明在鄭氏歷史現場缺席、卻強調因史料徵用能力而無處不在的「我」，反而透露出將史事浪漫化、近於神話式的書寫基調，全篇因而洋溢著因浪漫情調而更顯強烈的自我認同確立欲望。

〈台灣紅淚史〉以鄭氏妻妾為主軸，鄭家男子反而成為這些女性存在的輔佐條件而被淡化，但其中仍存在著連結鄭氏由華南渡台的重要男性——陳永華。如同一作者所出之〈國姓爺後日物語〉所示，碩儒陳永華是一手掌管台灣經營的「大宰相」，種蔗製糖、設鹽田專賣鹽、設聖廟建學校，並乘清朝廷實施「堅壁清野」之策時收容大舉來台的移民數萬，加速台灣開拓速度。正因「有著陳永華的殖民政策，才有今日的台灣。想到數以千百萬的明朝遺民，在台灣土地上飲恨埋骨後，在地下看著現今清朝衰亡的局面，值得人們深思」。而因為「台灣快速開拓出良田增加稅賦，使鄭氏之富日益累積」，「今天我們台灣總督府也該向陳永華表達敬意才是」。〈台灣紅淚史〉——如果「紅淚」部分是以華美淒豔的形容詞雕琢女性容貌與神采，藉以渲染鄭氏命運的悲涼，並以延續國姓爺故事的日本血脈；那麼作為情緒性要素所需依憑的骨架「台灣」時空，則來自於欲作為歷史重述人的敘述者「我」所閱讀檢討之眾多古籍。

江戶時代《國姓爺合戰》中並未述及的「和唐內」身後事與孤絕於中國

東南的海島台灣，在二十世紀進入台灣的日文書寫脈絡之際，所依憑的敘事骨架為創作者本身所歷的「當下」台灣空間體驗（如〈台灣紅淚史〉中對於總督府、殖民政策、愛國婦人會的建言），加上在所有述及鄭氏史事的資料中，對於其台灣經營部分著墨最深的江日昇《台灣外記》¹⁷。共三十卷的《台灣外記》中，第十二卷「入緬甸桂王受辱 閱祖訓成功歸天」後即為鄭氏在台灣的興衰過程。約成書於康熙末的《台灣外記》與其他史料的絕大相異處，正是在對於陳永華與鄭克臧的敘寫與強調。

陳永華「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口，插蔗煮糖廣備興販，於是年大豐熟民亦殷足」，並說服原只對台灣抱取「姑暫待之」的鄭經曰：「台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相，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將能與中原抗衡。並為了修葺朽爛之戰艦，而「檄南北路各鎮著屯兵，入深山窮谷中採辦桅舵」、「裝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台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陳永華實地踏訪南北山川、興辦糖業、開墾山林等物藏資源，並進一步確立台灣之兩洋貿易交通地位；在《台灣外記》中最重要的建設者，並非視台灣為「暫居之地」的鄭成功與鄭經父子，而是陳永華。¹⁸後因鄭經決策失當，使鄭氏勢力退守至澎湖、台灣，董夫人責鄭經曰「七府連敗，兩島亦喪，皆由汝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致左右竊權各樹其黨耳」。後當陳永華與眾多老臣陸續身亡，鄭經耽溺酒色，其後文武政事皆由鄭經長子鄭克臧決斷。年方十八的鄭克臧「聰明特達」、「明敏果斷」¹⁹，「有乃祖遺風」，鄭經見其所批閱之公文「條條有緒心大喜悅，以其後事倚托有人，遂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

鄭經死後，奸臣馮錫範與鄭經的四名弟弟，向董國太夫人讒曰克臧實為螟蛉子，董夫人半信半疑之間，鄭克臧已經被擊殺。陳夫人在聽聞死訊後趕到內庭質問董夫人後，「夫人叩首長號曰、願請監國收殮，相從於地下為鄭氏鬼願

17 江日昇，《台灣外記》，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8 此段引文皆出自《台灣外記》卷13。

19 《台灣外記》卷23。

畢矣。國太允其請，夫人遂出，見監國屍，相抱號哭」。而面對要陳夫人珍重有孕之身的董夫人使者，陳氏答曰「成立之父，尚不能保七尺軀，何況此呱呱耶」。堅持殉節之下，「國太嘉之，隨遂其志，令人結臺」。

對比之下，可知在董夫人性格與鄭克臧夫妻被誣陷殉死的情節中，上引〈台灣紅淚史〉皆直接承襲自《台灣外記》。「成立之父」與「七府連敗」的兩段台詞，更是將《台灣外記》的文言文直接改為日文的漢文訓讀體。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太（董夫人）「令人結臺」，在〈台灣紅淚史〉中卻被誇大豪華化為董夫人贈送了蓮花台給陳夫人。這或許是為了營造陳夫人自縊由「此岸」至「彼岸」時的淒美氛圍所必須加添的裝飾，但更可能來自對於「結台」一語的理解錯異。

三、西川滿〈赤崁記〉：在地化認同之欲求

「國性爺」故事的熱潮再度發生於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至1940年代前期，在台灣出現曾擔任台北帝國大學總長的幣原坦《朝向南方文化的建設》（《南方文化の建設へ》，1938）與終戰後仍持續從事鄭成功史事研究的石原道博《鄭成功》（1942）著作。前者為即將大舉施行之帝國南方政策的釋義與宣導，後者則為本於學術考察成果之敘事文章。由延平郡王祠整修而成的「開山神社」，從1939年動工重修為純日本式神社，於1941年完成。而主導1940年以後台灣文壇的重要人物西川滿，在此時期所創作之〈赤崁記〉則是襲用《國姓爺後日物語》的「續作」方式，在敘述者「我」與一對1940年台南市的年輕男女的引導下，使鄭氏故事在1940年代的新興台灣（而非已沒落的日本平戶）再度「混血」，展現出「歷史」小說書寫與自我認同的詭譎關係。

〈赤崁記〉的敘述者第一人稱「我」，因演講活動而來到台灣最早開拓的舊港都台南，對於在地台灣人的文化古蹟意識薄弱感到無奈輕蔑，而只想收集觀看寺廟神像、民俗版畫的「我」，對於突然現身、逕自開始對「我」展開台南歷史解說的陌生陳姓青年原本敬謝不敏，只沉浸於眼前的赤崁樓建築與「花娘」悲戀的自我想像。但在金銀紙店裡見到一幅非賣品的神秘古老版畫，以及聽聞陳姓青年及其女伴一席關於鄭克臧夫婦的末路之談話後，回到台北始

翻閱陳姓青年所郵寄之陳迂谷《偷閒集》與私藏本「求無不獲齋」《台灣外記》，而進入原先冷漠抗拒的歷史世界。那是在鄭成功死後，由陳永華銳意經營而成的新興世界台灣。鄭經攻略失敗退守澎湖與洲仔尾，唯賴監國世子鄭克臧胸懷日本與南洋獨撐大局。在猛將劉國軒不問政事之下，私心甚重的馮錫範先用計卸下陳永華兵權，在陳永華與鄭經相繼死去後，誣陷鄭克臧為螟蛉子並誅殺之，以使己婿鄭克塽即位。鄭克臧妻後來更自縊以殉夫——「我」於是興起將這段史事化為創作的念頭，將婦隨夫死的鄭克臧夫妻比擬為源義經與靜御前，並擬更動克臧夫人上吊情節為「在墳前寂寞凋零」，因為如此才「更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也「增添寂寞遺緒」。「我」並計畫在創作中加入「文正公兮文正女」的民間謠曲歌詞，在遍尋古籍卻未見記錄的情況下再度動身前往台南，才發現陳姓青年的郵件地址竟是「陳氏家廟」——陳永華舊宅邸。在陳氏家廟無以數計的眾多牌位前，「我」思及鄭氏三代同時也是「陳氏悲史」，且發現陳氏「始祖諱滿」，正與自己的名字相同；為這神秘奇遇心蕩神馳的「我」，最後在滂沱大雨中彷彿目睹家廟前的石龍雕刻飛天而去。

〈赤崁記〉中先以陳姓青年與女伴之口說出「能相信的只有《台灣外記》」，後來「我」亦以《台灣外記》為主軸，參照《偷閒集》、《台灣府志》等資料，進入鄭氏史事的敘說與想像；使向來〈赤崁記〉的相關研究皆認定西川滿採用《台灣外記》的記述為軸，再加入鄭克臧在赤崁樓遠眺波濤，遙想「祖父的日本血統，是其生涯的唯一驕傲，」「自己身上也流著這樣的血液」，眼前時期必須以「高度國防國家建設」為重等情節，以符合1940年代國策需求的戰爭語言。然而在〈赤崁記〉中，卻存在著《台灣外記》所無，卻是〈台灣紅淚史〉的獨創情節：如鄭克臧在死前曾叮囑陳夫人保重，鄭克臧被擊殺之際與行兇者的對話等多處，無法一一列數。可知在《台灣外記》與〈赤崁記〉之間，應仍介在著〈國姓爺後日物語〉與〈台灣紅淚史〉等日文創作。

前述〈台灣紅淚史〉轉換自《台灣外記》的二句漢文訓讀體，在〈赤崁記〉中董夫人則轉以口語責罵鄭經：「因為你這傢伙優柔寡斷，只任憑左右牽著走，部下才會各自結黨，招來今日的失敗」（原文：「お前がとかく優柔不斷でいたづらに左右に任せつきりにして置いたから、輩下各々党をたて、今

日の敗北を招いたのだ」)；而陳夫人「成立之父」一句則與〈台灣紅淚史〉完全相同。陳姓青年駁斥官書之正統性時所說「如果鄭克臧是螟蛉子，那麼愚鈍的鄭克塽更是螟蛉子」一句，也脫胎自〈台灣紅淚史〉的評述。另一方面，從強化董國太夫人、陳氏妾、陳永華女對於鄭氏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部分，亦可知不諳古典漢文解讀的西川滿，應非直接取材於存在著眾多戰爭畫面描寫的《台灣外記》，而是依循採繼了《國姓爺後日物語》的敘事模式。加上從文言文到口語日文的語言轉換之承襲，〈赤崁記〉與《國姓爺後日物語》的關連性應可得到確認。而從西川滿與在台之上層日人社會女性所刊行之《台灣婦人界》的密切關係來看，²⁰ 西川與成員高度重疊的「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亦不應全然陌生；令人玩味的是，〈赤崁記〉中卻全未言及這二部幾乎可確定為其創作來源的書志。

除了《台灣外記》之外，〈赤崁記〉中更清楚標誌著現陳迂谷《偷閒集》、《台灣府志》、林謙光《台灣紀略》等書志作者與題名；述及董夫人懷疑鄭克臧為螟蛉子處，則引用《韓非子》「三人成虎」典故；鄭克臧為平靜心志而展閱的是《楚辭》篇章，且是漢文訓讀體的原文而非口語化的說明。由陳姓青年的「能相信的只有《台灣外記》」以及其所郵寄而來的《偷閒集》，「我」才拿出收藏已久卻未曾閱讀的《台灣外記》，以及之前並未有肯定評價的陳迂谷詩集。但在身著長衫、文質彬彬的古風書生陳姓青年，以及其女伴——斷髮吸煙、洋溢官能魅力的「新女性」，此對融雜了中國古典與西洋文化的特異伴侶的牽引下，「我」沈浸於以漢族人名、書名、經典文句所建構而成的歷史世界；更在「陳氏家廟」處，察覺自己正身處於一連串神秘經驗之中，以牌位「始祖諱滿」字樣發現自己與鄭氏悲史＝陳氏悲史＝台灣歷史的關連。

回到台北以後，下了幾天的雨，重陽之日的傍晚終於放晴，清澄的天空中閃爍著星光。寫秋初的杜甫詩中有「大火復西流」一句；進入九

20 參見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5.03）之「西川滿」、「台灣婦人界」等相關詞條項目。

月後，天蠍座的Antares很明顯的傾向西方星空，坐在二樓朝南的書房裡，可以看到射手座的銀箭在天空正上方閃耀。

「我」在融合了唐詩意像與西洋星象的夜空下，收到寄自台南的《偷閒集》。正如陳姓青年帶領「我」造訪的擺設著西洋鐘、白色罩紗大床與台灣藤椅的女性房間，以及此二人的形象所營造出獨特氛圍，「我」在全篇中都處於以中國古典與西洋物質符號所打造的異國意象世界中。明明多有承蹈引用卻對《國姓爺後日物語》掩藏不及之行為，所凸顯的是「我」的特質＝在「高度國防國家建設」國策的1940年現下所存在的，被古典漢文化（而非現代台灣的日文文本）所召喚與指定的歷史敘述者。想像民眾對鄭氏史事的鍾愛正如對「源義經與靜御前」的「我」，所構思的是「以鄭克臧為中心的陳永華父女」故事。「開發今日台灣之重要資源的糖與鹽，並設立租稅制度」的陳永華與「台灣」的密合度遠高於鄭成功、鄭經，「我」即是在古典漢文化脈絡的指名下，被賦予讓高度開拓、兼具東西洋色彩、可作為南進基地的（日本殖民地）台灣「可視化」的敘事者。

西川滿〈赤崁記〉中以書志作為確定敘事者在「台灣」歷史性定位、甚至打開時空旅次鑰匙的修辭方式，在小說〈稻江冶春詞〉、隨筆〈台灣的火車〉等文中²¹，亦皆有明顯的運用。〈稻江冶春詞〉中的「我」，獲得心儀的藝姐「抹麗」所擁有之連雅堂〈香草箋〉的同時，也繼承了「在台北橋附近」經營書局、時時教唱抹麗詩詞的連雅堂之「寂寞」詩人形象，以及抹麗那戴著銀針鏈錶、學生貌的愛兒形象疊合，確立了台灣開拓歷史重地、西洋現代化色彩濃厚的大稻埕之文化訴說者身份。與以另一台灣開拓重地——港都台南為舞台的〈赤崁記〉互為呼應，分別完成於1940年初與年末的兩篇小說，除了呈現出同於〈國姓爺後日物語〉以珍稀抄本文獻作為「歷史性」的誇證，也都以實存的地方、人物掩映於浪漫感性的情節中，使文本渙造出實虛莫辨，看似與古典漢

21 西川滿，〈稻江冶春詞〉，《文藝台灣》1卷1號（1940.01）。西川滿，〈台灣的汽車〉，《台灣時報》（1942.06）

文化以書志存在一脈相承，實質卻是去歷史脈絡的當下「在地性」。

隨筆〈台灣的火車〉則是記述「熱愛火車的我」在週日下午至「新公園」散步，眼見戶外展示的九號與一號「騰雲」火車頭之相關敘述錯誤，而以「這塊因歲月而斑駁的立牌文字解說，可以完全相信嗎？為了確定真偽，我們必需從清國最早的鐵路——上海吳淞之間的鐵路開始說起。」的說明姿態，進入清季劉銘傳設置基隆至新竹的台灣鐵路，以及開闢台北「城內」、鋪設電線的歷史知識講述。「我」在典雅紳士的九號與平實堅固的一號火車頭樣式中，聯想分析其製造國度——英國與德國的不同國情。更在「凝縮了德國科學精髓」的一號火車頭前，想像「厭惡英國」的劉銘傳、與二名德國工程師之間關於科學與東洋文化的交談。「我」為了確認劉銘傳官邸所在地，離開新公園來到位於書院町的總督府圖書館，在這與台灣鐵路鋪設有密切關係的，「充滿異國情調」、「白蟻蛀蝕」的「歷史感濃厚」的建築物中，「我」在「領台之前部門」無法尋得任何「劉銘傳時代的市街圖」，卻在「領台直後」部門中的「明治三十年台北市內圖」中發現座標，隨即在紙上目睹二名德國人工程師沿著街路走向位於當時西門街的巡撫官邸，而在「觀音素心蘭」的花香中，旁聽劉銘傳對著德國工程師談論征戰中吟詩以得寬裕的「東洋」心境。稱揚德國貶低英國、風雅詩文的「東洋」與理性科學「西洋」的角力，〈台灣的火車〉較諸珍珠港事變爆發前的〈稻江治春詞〉與〈赤崁記〉，明顯充塞著戰爭時期日本帝國的總力戰動員符碼。但其中引領開啟「我」進入似幻似真歷史情境的，仍是舊日珍稀文獻——「明治三十年台北市內圖」——具備著把未經體系組織化的地方情景，藉地形測量等科學方式「可視化」、「定型化」的功能。〈台灣的火車〉則藉著一個下午的經驗，將被「可視化」、「定型化」的知識化再轉化為文字風景，台北市則在這樣的書寫與閱讀行為的承轉過程裡，產生了從「空間」轉為「地方」的認同建立能量。

〈赤崁記〉在1940年12月1日首刊於《文藝台灣》後，同月22日即以單行本《赤崁記》問世；²² 1942年12月以小說集《赤崁記》形式於東京再度出版，

22 西川滿，《赤崁記》（台北：日孝山房，1940.12）。

同集中另收錄〈雲林記〉、〈元宵記〉、〈朱氏記〉、〈稻江記〉、〈採硫記〉等篇，皆為西川滿以早期台灣開拓史為題材創作之小說。²³而〈台灣的火車〉後，則有〈二名德國人工程師〉²⁴、〈龍脈記〉²⁵、《台灣縱貫鐵道》²⁶等以劉銘傳任台灣巡撫至日本領台，鐵路電信網絡等西方文明建設進入台灣，過程中西洋文化與包括風水迷信、詩文風流等層面之東洋價值折衝的小說。〈赤崁記〉與〈台灣的火車〉亦有著極為相似的敘事模式——與作者本人極為疊合的敘述者「我」，以及藉由書志興發想像並進入過去的時間串連。如果鐵路系列是藉由子彈、火車、石燈籠等意象「重新確認日本殖民政權在台灣的正統性，以正當化當下帝國在台灣之異族軍事動員」²⁷，而其中藉以呈現歷史臨場感、消泯跨時代書寫的時間溝隙的是從軍記者所攝製之照片。那麼連結明清之交的十七世紀與「大東亞」想像的1940年代者，即是「國姓爺」故事與《台灣外記》與《國姓爺後日物語》。

藉著《台灣外記》與眾多漢籍書志的持有與消化、歌謠傳說等在地民間知識、由鄭氏一族英雄烈女的鬼魂所帶領，台灣開拓史事從珍稀鈔本文人知識、口語傳承，化為可反覆翻刻出版的現代小說；國姓爺也從九州平戶、福建南安渡海而來，落地成為具有混融日本與中華、海洋血統特性的台灣創世神話。再透過古地圖、舊圖版、郵政遞送等具有空間、形象描繪效力的圖像與符號，規塑讀者想像力通往在鐵路、教育等現代化建設下，取代大陸中華、海洋南島的日本帝國所繪製的地景與版圖。

誠如《國姓爺後日物語》中可見來自近松門左衛門《國性爺合戰》與江日昇《台灣外記》的襲用與轉引，所有書寫都與前行文本存在著或隱或顯的「互

23 發行所為東京：書物展望社。西川滿因為這本小說集的出版功業，獲得1943年2月「第一回台灣文化賞」之「文學賞」部門獎項。

24 西川滿，〈二人獨逸人技師〉，《台灣鐵道》361號（1942.07）。

25 西川滿，〈龍脈記〉，《文藝台灣》4卷6號（1942.09）。

26 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1943年7月1日於《文藝台灣》開始連載至1944年12月8日《台灣文藝》1卷1-7號，共11回。

27 朱惠足認為西川滿將領台初期的歷史事實，在《台灣縱貫鐵道》中改寫「成為一則表現日本新殖民政權蹣跚前進、試圖超越中國在台灣的文化傳統之寓言」。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08），頁114。

文性」；更無論史料毀損散逸，只能從地方記憶與前人創作之中擷取骨架片段的鄭氏史事書寫，蹈用與互文誠屬必然。然而突顯出「互文性」作為研究方法之必要性的，並非僅在於摘取與前行文本或對象事實之間的近似，而更在於察覺近似與相違的平行與歧出後所能開拓的論述空間。

事實上，西川滿〈赤崁記〉在以鄭氏後日談為題材的拉引參照之外，小說結構上更有一互文對象，即是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日本浪漫主義文學家佐藤春夫於1920年來台旅行，返日之後於1925年出版其台灣題材小說之代表作〈女誠扇綺譚〉；對於西川滿與在台日人文學家皆發揮理論影響力的島田謹二〈南島文學志〉系列論文中，²⁸〈女誠扇綺譚〉位居開啟台灣日人現代文學的決定性地位，島田謹二對其中旅行與異國情調的營造、對台灣的緻麗描寫皆有極高的評價。〈女誠扇綺譚〉以旅居古都台南的日本人「我」，在台灣友人引導之下進入台灣開拓歷史現場解開謎團的放浪、冒險歷程為骨架，以熱帶台南頹傾腐壞的古蹟為舞台，襯引出敘事者「我」在異文化語言脈絡下的虛無心境。〈女誠扇綺譚〉在台北帝大學者島田謹二的頌讚下成為經典，卻也同時成為在台內地人在確立自我書寫位置與風格時的首要挑戰對象。

1943年在以台南地方文學為主題的座談會中，長期居住於台南的《文藝台灣》同人新垣宏一、河野慶彥以「在台南住久了，再三讀過（〈女誠扇綺譚〉）之後，開始覺得難道像這樣只是寫到台南就可以看作台南的文學了嗎？」「我在內地時也因為這篇作品對台灣產生憧憬，但真正住在這裡以後才發現台南是不同的。那毋寧只是一個時代的夢幻，現實的台灣要來得更為熾烈、有活力才是。」表明了對於旅人文學〈女誠扇綺譚〉的不滿，並同時顯露出居住於現地、近接於現實的自負。而座談會中被同人用以代表「當今」台南的文學的，正是西川滿〈赤崁記〉。新垣宏一並認為「這是佐藤春夫以來，最認真面對台南的作品」。²⁹

事實上在創作〈赤崁記〉前，西川滿曾請託當時已經以考證〈女誠扇綺

28 島田謹二，〈南島文學志〉，《台大文學》1卷5號（1936.12）

29 河野慶彥、大河原光廣、新垣宏一、日野原康史，〈台南地方文學座談會〉，《文藝台灣》5卷5號（1943.03）。

譚〉背景資料著名的新垣宏一，為其收集相關資料與實地導覽。³⁰ 這樣的實地走訪經驗，確實呈現為〈赤崁記〉中古都台南明確的歷史氛圍與地方感。〈赤崁記〉中「我」與熟知鄭氏掌故的陳姓青年，相對於〈女誠扇綺譚〉中「我」與熱愛台南歷史的「世外民」；對台南的態度由失望轉為熱切的過程，以灼熱熾人的體感帶出台南作為「異空間」，「我」由冷漠到自主參與解謎的過程皆極為近似。然而不同的正是「我」與謎題核心的距離問題，以及其中「我」的顯像方式。〈女誠扇綺譚〉的「我」與「世外民」雙人組因為對於體制的抗拒，終日沉浸酒色自我放蕩已行之有年，但面對謎題：沈氏大宅中的神秘女聲與命案的態度卻不相同，相對於「世外民」所相信的鬼神報應，「我」則欲以理性一一破解，甚至不惜對於好友「世外民」冷嘲熱諷。然而後來事實揭曉，「我」發現一切都在自己所揣想掌握之外，遂離開台灣返回日本內地。如果將「我」的離去，視為內地旅人對於自我與作為異文化他者的殖民地台灣之間距離存在的承認，而這樣的承認實可連結至對於殖民體制之暴力性的醒覺，則可看出另一方面〈赤崁記〉中，「我」藉由對於在地民俗熱愛的宣示與被歷史鬼魂指名代言的情節，突顯出相對於旅人的長期居住者「內地人」的獨特自負。〈赤崁記〉中扮演解說、翻譯台灣歷史角色的陳姓青年，是主動在赤崁樓等了「我」一天，並熱烈期待「我」能將台灣歷史化為文字記錄。陳姓青年積極召喚「我」進入的，並非無確切年分可考的〈女誠扇綺譚〉中的台灣民間開拓傳說，而是鄭氏第三代史事。而最後「我」即藉著信封地址的指引，進入陳姓青年所象徵的歷史世界，發現自我與鄭氏之間的神祕連結：「始祖諱滿」，〈赤崁記〉即是陳姓青年與含冤而死的鄭克臧、陳氏女夫婦所冀求的文字記錄／歷史書寫的果實。

陳姓青年的主動積極態度，以及陳姓青年其實就是謎團的一部份，最終結局是「我」在原本即對於民俗宗教、文物書志極感興趣的性格引導下，接受並進入了謎團世界本身的命運。〈赤崁記〉所彰顯的是極為了解在地台灣並因而

30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壇における「女誠扇綺譚」受容の行方〉，《藝文研究》83號（2002.12）。

得以承接歷史的「我」，此即是〈赤崁記〉與承認異文化／自我之間的永遠隔絕之後離去的〈女誠扇綺譚〉「我」之間最大的差異。而以熱愛台灣的民俗、宗教、稗史自我標舉的「我」，實際上展現的正是與新垣宏一、大河原光廣言辭一脈相通的，長久居住者對於「台灣」的在地化認同需求。

四、結語：歷史一小說一宗教

國姓爺鄭氏故事從來都在多種文體、表現形式間流傳；1930年前後，《台灣日日新報》中頻繁出現「國姓爺」字樣，其中包括鄭成功攻台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揆一所著《被遺誤的台灣》之日譯連載。原來1930年正為安平開港三百年之期，台南州與總督府、帝國大學等機構合作舉辦「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史料展覽會」，以史料為中心的展覽在始政紀念日、也就是6月17日前後舉行為期約十天。可知此時對於鄭氏史事的觀照已進入官方、學術研究層次，而在宣傳安平＝「台灣文化」之際，鄭成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象徵；對於台灣總督府而言，「鄭成功」更是足可與始政紀念日相映成輝的符碼。

1940年11月，新興京都所攝製之電影「國姓爺合戰」在日本內地上映。從拍攝過程到上映前後的報導與宣傳，皆強調這是「皇紀二千六百年奉祝映畫」。但同樣在眾多文藝活動中亦配合「皇紀二千六百年」的台灣，同片於1941年1月上映時，卻未見任何與「皇紀二千六百年」相關字樣，而只有對於劇情的介紹與演員表。電影「國姓爺合戰」劇情為梅檀公主在明朝危急之際漂流至日本，被惡漢欺凌之際為和唐內所救。和唐內因此得知大明滅亡的消息，於是將梅檀公主託付給妻子小睦照顧，隻身赴明。因為姊姊錦祥的自殺，甘輝終於願意援助和唐內，但此時出現了妖女彩花，和唐內在千鈞一髮之際獲救，扮演關鍵角色的正是其妻子小睦。據此可知，電影「國姓爺合戰」雖沿用了近松門左衛門《國性爺合戰》的和唐內、梅檀公主、錦祥與甘輝等人物，亦增添小睦、彩花等構築和唐內感情與動搖的女性角色，進一步脫離鄭氏史事，而具備濃厚的聲光娛樂效能。這樣的「國姓爺」顯然與台灣「內地人」「本島人」所認知的鄭成功皆有差距，亦未見「台灣」之存在，以「皇紀二千六百年」作為宣傳口號不具積極的意義，或許與這部片在台灣並未有後續迴響有所關連。

沒有「台灣」在地感的國姓爺故事電影在台灣未受注目，另一方面〈赤崁記〉卻以1940年台南城市的空間與戰爭下的時間感，在與佐藤春夫名作〈女誠扇綺譚〉互文的前提下，甚且向日本文壇表明了在台內地人具有的「在地性」書寫優勢；不只是顯露了敘事者「我」書寫「台灣」歷史題材的欲望，更在鄭氏血統、文化歷史的條件下，凸顯了延續自十七世紀日本近世文學國姓爺故事傳統的、這種書寫欲望存在的正當性。識者常以〈赤崁記〉對於《台灣外記》的刻意引用與增寫，視為殖民者對台灣歷史詮釋權的竄奪。然而既然鄭氏一族活躍於東亞海洋的史事，從未進入以大陸為立基點的中國官方「正史」，鄭芝龍在明清之間的猶疑、鄭成功抗清之際乞師請援於江戶幕府、與清廷且談且戰的策略運用，便無法以近代單一國族認同來界定。從悲劇英雄鄭成功的末路蒼涼，到陳永華、鄭克臧對台灣的規劃建設與放眼南洋，1940年代出於在台內地人之手的國姓爺歷史小說，重點不在於國姓爺或台灣的「歷史」本身，而在於其中急切而強烈的「在地性」、亦是「在台」身份的自我顯露。這樣的認同確立、起源神話的尋求欲望，早在1920年代前後的繪畫、短歌俳句等創作領域中發其端，但卻是在戰爭期間欲趨熾烈。³¹

本稿僅就日本人書寫脈絡中的「國姓爺」鄭成功，從知識化與文學化的觀點加以探究。而在台灣人作家文本部分，則因其書寫所延續的脈絡並非日本近世近代文藝，而為民間文學與民俗宗教層次，而勢必在方法上有所區分。鄭成功在台灣民間被奉為神祇祭拜已久，史實上未曾涉足之處亦流傳著靈驗傳說；從〈赤崁記〉中神秘的陳姓青年到結尾處的神龍飛天，台灣「內地人」的自我歷史定位書寫竟也歸趨於宗教崇拜色彩。歷史題材下的小說與宗教，與國族主義的想像呈現了非單一對位的強烈呼應關係。十八世紀前中期國姓爺創作與戲曲的盛行，與同時代德川幕府以詩書藝文教養取代武力權威、並以鎖國等措施確立其統治權下的民間心理反動，有著密切的關連。³²亦即是說，在既有

31 橋本恭子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華大學中文系，2003）與〈在台日本人の郷土主義—島田謹二と西川滿の目指したもの—〉（《日本台灣學會報》9号，2007.05）中所提出的在台內地人認同建立問題，給予本稿極大的啟發。

32 前引江藤淳，〈「國姓爺」と国家意識・近松門左衛門（3）——文学史に関するノート—8〉。

秩序崩解、政府劃定之藍圖雖合理而堂皇，個人與地方社會卻仍在摸索猶疑，這新秩序到來前的戰亂期中，由諸藩分立朝向幕府集權的十八世紀前期，到日俄戰爭後帝國自信大增卻經濟蕭條的1910年代，再到始政將近半世紀、帝國版圖將以之為跳板拓進南洋的1940年代台灣。國姓爺系譜故事的書寫過程與內容轉變，並非只是包括「內地人」在內的台灣文學者的「溯源」行為——也因此小說情節忠於「歷史」與否的爭論對探究其認同成分的幫助有限，更何況是在鄭氏史料嚴重毀損的條件限制下——回到書寫行為此一文學成立層面來看，更是一種與包括政策、戰事、文壇狀況在內的時代條件對話，以面對當前與未來的自我位置確定，以至文化生產的行為。如果從〈國姓爺後日物語〉到〈赤崁記〉的主角，都是那強調行走立足於「台灣」的「我」；「國姓爺」系譜故事中那些反目的父子叔姪，寧可背離血緣或以血緣作為武器以成就節操、或爭權奪利的鄭成功家族，會否也可以是一個「隱喻」？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5.03）。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古本小說集成·台灣外記》（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石原道博，《國姓爺》（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67）。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想》（台北：麥田出版社，2009.08）。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04）。

西川滿，《赤崁記》（台北：日孝山房，1940.12）。

周婉窈，《面向過去而生——芬陀利室散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9.07）。

鹿島櫻巷，《國姓爺後日物語》（日本東京：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發行，1914）。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中島利郎，〈西川滿論〉，《（外地）日本語文学論》（2007.03）。

井上厚史，〈『国性爺合戦』から『漢国無体 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時代における華夷観の変容〉，《同志社国文学》58号（2003.03）。

西川滿，〈稻江冶春詞〉，《文藝台灣》1卷1號（1940.01）。

——，〈二人獨逸人技師〉，《台灣鐵道》361號（1942.07）。

——，〈龍脈記〉，《文藝台灣》4卷6號（1942.09）。

——，〈台灣縱貫鐵道〉，分別連載於《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共11回，
《文藝台灣》計5回，6卷3-6號、7卷2號，1943.07-11、1944.01；《台灣文藝》計6回，1卷1-4、6-7號，1944.05-08、11-12。

江藤淳，〈「国性爺」と国家意識・近松門左衛門（3）——文学史に関するノート—8〉，《文学界》20号（1966.01）。

和泉司，〈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壇における「女誠扇綺譚」受容の行方〉，《藝文研究》83號（2002.12）。

河野慶彦、大河原光廣、新垣宏一、日野原康史，〈台南地方文學座談會〉，《文藝台灣》5卷5號（1943.03）。

神谷勝広，〈豆本『国性爺合戦』——広範な流布の可能性〉，《演劇研究会会報》31号（2005.06）。

島田謹二，〈南島文学志〉，《台大文学》1卷5号（1936.12）。

張文薰，〈1940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台灣文學學報》19期（2011.12），頁99-132。

廖肇亨，〈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域外漢籍研究集刊》3輯（2007.05）。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12卷3期（1999.09）。

橋本恭子，〈在台日本人の郷土主義—島田謹二と西川満の目指したもの—〉，《日本台湾学会報》9号（2007.05）。

（二）學位論文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三、報紙文章

西川滿，〈台灣の汽車〉，《台灣時報》，1942.06。